

社会图像丛书

做人之道

——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

王德福◎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社会图像丛书

做人之道

——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

王德福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王德福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社会图像)

ISBN 978-7-100-09516-7

I. ①做… II. ①王… III. ①农民—人生哲学—
研究—中国 IV. ①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56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做人之道

——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

王德福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16-7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24.00 元

序

一

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农村变化尤其剧烈。世纪之交，一直相对稳定和封闭的中国村庄同时在三个层面处在巨变中，一是国家取消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农业税，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二是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村庄边界开放，传统上构成农村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结构（血缘、地缘组织）迅速解体；三是农民价值发生变化，活着的意义正在重新定义中。这三个层面的巨变，构成我们所谓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我们的华中村治研究是从 1990 年代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农村的。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甚至村治基本结构也存在区域差异。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都可能有巨大差异，我们的研究因此由政治学转向社会学的研究，由制度研究转向社会基础结构与基本秩序的研究。大约到了 2006 年，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都是要涉及构成制度与社会基础结构运行前提的人，涉及有血有肉的芸芸众生。而在世纪之交，农村剧烈

变迁,恰好将一般只是隐藏在行动背后的价值重要性凸显出来了。人们关于生命意义与价值定义的变动,对社会基本秩序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我们就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进入到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的研究中来了,所涉及的学科也从政治学扩大到社会学、人类学、农业经济学等等,研究内容自然也就超出了村治研究的范畴。

学术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积累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学术推进往往是不自觉的,是长期浸泡在经验中(即“饱和经验法”)而被实践逻辑推动的结果。学术积累则一直是我们的自觉。我们既在不断地开掘新井,也在接力式地深挖老井,我们发现其实有一脉深层地下水将这些井贯通了起来。死水井其实都是活泉眼,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深层的中国农村,甚至整个中国。所谓深层水脉便是具有全息性的经验本身。正因为有了这深层水脉的贯通,我们对每一口井的认识都有了更具总体性的关照。

最近几年,我一直有意识地提这样的要求:博士生将他们的毕业论文作为团队学术积累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们在具体的选题上享有非常充分的自由度,这在他们呈现出来的作品上已经得到证明。实践表明,这种学术积累既有效地推进了自身研究的发展,也有助于同既有研究传统对话——我们一直对这种对话持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二

王德福的《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便是这种学术积累和对话的一次体现。

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初确定选题的时候,我曾根据他以往的研究兴趣建议他做农民的面子观念及区域差异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之后,他觉得面子只是理解农民行为逻辑和乡土社会运行的一个切面,他希望从更为总体性的层面理解农民做人的内涵及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并借此形成华中村治学人的经验研究与新儒家和本土心理学的对话,拓展本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我很同意德福的计划,因此就有了这部书稿。

这些年,我们在乡村社会性质及其区域差异、农民行为逻辑及价值意义等方面有了可观的积累。杨华对农村妇女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属的研究、宋丽娜关于农村人情社会基础的研究、刘燕舞等对于农民自杀问题的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我本人这些年提出认同与行动单位、区域差异、半熟人社会、农民价值类型等概念,就是在提炼若干中层理论,推动学界对本土社会的认识。这项工作显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德福希望在这方面作些努力,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界同仁的相关研究,展开对话,取长补短。德福在他的研究中借鉴了新儒家和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资源,但他并不是要做社会心理学或是儒学研究,而是从事一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我们一直坚持,理论资源要活学活用,要以对经验的厚重认知为基础,最终落脚于经验理解。当前学界的一大痼疾就是处理不好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要么生搬硬套理论来切割经验,要么陷入理论的抽象演绎。应该说,德福是清醒的,他较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

“做人”是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特点是“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不解释还略知一二,解释起来反倒可

能越说越糊涂。这是德福将日常用语转化为学术概念面临的考验。他从人本心理学那里借用了“自我实现”的概念,并发现儒学中的“成人”思想关照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人何以为人。这样一来,他就触及了中西方文化对“人”之规定性的重要差异。德福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进行简单的中西对比,他进一步将“做人”操作化为“双重定位三层目标”的价值体系,将“熟人社会”操作化为“结构—文化网络”,从而揭示了熟人社会对做人逻辑的影响,展现了农民做人实践的区域差异及变迁。

我觉得这部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区域差异作了初步的理论提升。区域差异是华中村治研究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发现之一,它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南方、北方和中部农村的重要区别,为理解中国农村的诸多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中层理论框架。德福用“个人—自我扩大化—自己人结构/公私价值规范—社会结构类型的区域分布”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个人与区域差异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区域差异对个人心理、行动乃至价值观的影响,证明了区域差异的学术意义。二是尝试打通儒学大传统—社会小传统—个人的关系。在我看来,新儒家似乎只关注儒学大传统,把儒学玄学化和贵族化了,缺乏对剧变社会和普通人民日用伦常的体察,而这本该是儒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本土心理学则忽视了社会小传统这个中间环节,要么陷入对人的碎片化认识,要么直接套用大传统,德福的研究表明,社会层面的差异对个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从认识和解释“差异”开始,逐步提升到“一般”要比直接探讨“一般”更有助于形成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德福打通三者关系的尝试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他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学力有限,他的尝试还不能说

非常理想,这也督促他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厚积薄发,奋力前行。

德福还表达了他(也是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共有的)对社会变迁的体察和人文关怀。社会巨变,价值重构,一切都在激荡流动之中,正所谓“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所归”。德福揭示了社会变迁在农民做人价值和实践上的表现,并呼吁重建个人与社会的本体性关联。不管读者是否同意他的设想,但这种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情怀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这位年轻作者在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之间达到的非常难得的平衡。

三

华中村治学人自农村研究起家,而且在将来一段时期,仍会继续将主要力量投向农村研究,同时,我们也始终热忱地关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民族的骨血里蕴藏着求变图强的基因。值此巨变时代,欲为民族开新命,只靠哲学层面的对话和论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直接进入民众的生活实践。“礼失求诸野”,在田野中或许比在古籍文本中更能发现礼乐制度悄然萌发的新生命,知识生产者太需要重新直面生活实践者了。

我欣喜地看到,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的年轻学人正在沿着这条道路成长着。我对他们的明天抱有热切的期待。是为序。

贺雪峰

2014年6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做人与自我实现	1
二、研究回顾	4
三、研究框架与核心概念	16
四、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熟人社会的理想类型	27
一、“自我”扩大化与“自己人”的生成	31
二、自己人单位与熟人社会的结构类型	43
三、结构地位、结构密度与结构空间	56
四、熟人社会的秩序原理	61
第三章 人伦关系中的“自我实现”	74
一、心理学视域中的自我实现	76
二、儒学视域中的自我实现	84
三、熟人社会中的成人	98
第四章 “过日子”:做人的生活之道	112
一、“过日子”的基本含义	114
二、“过日子”的基本逻辑	119
三、“过日子”的历史变迁	135

2 做人之道

四、“过日子”的区域差异·····	143
第五章 “结人缘”:做人的交往之道 ·····	154
一、做人与社会交往·····	155
二、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	166
三、社会交往的区域差异·····	181
四、熟人社会交往逻辑的变迁·····	193
第六章 “崇公抑私”:做人的共生之道 ·····	201
一、做人中的公与私·····	204
二、熟人社会的公私转化机制·····	215
三、公私运作逻辑的区域差异·····	221
四、公私运作逻辑的变迁·····	231
第七章 结 论·····	240
一、熟人社会与中国农民的“即凡而圣”·····	241
二、自我扩大化与熟人社会的区域差异·····	248
三、“伦理性成人”的目标价值体系及区域差异·····	255
四、半熟人社会化与做人之变·····	263
五、“收拾人心”:重建人与社会的本体关联 ·····	271
参考文献·····	280
附录 田野工作概况·····	296
索引·····	302
后记·····	307

第一章 导 论

一、做人与自我实现

本书的主题是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及其嬗变。“自我实现”是心理学的经典命题之一,在中国人的生活语境中它被表述和实践为“做人”,是包含了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交往伦理的三位一体的完满人生。农民的“做人”是在熟人社会场域中展开的,随着熟人社会逐渐褪去传统时代的封闭和静止,开放度和流动性空前增加,农民“做人”的内涵和实践逻辑也在发生变革。本书旨在建构一套理解农民做人的理论框架,以此分析转型期乡村社会变迁与农民做人逻辑的嬗变。

这项研究是笔者所在的华中村治研究学派学术演进脉络的一部分,并且受益于华中学者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学术积累。世纪之初,华中学者自觉地将研究重心由村民自治转向“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①,致力于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在此基础上理解政策实践、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的机制与逻

^① 冯小双:《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辑。经过多年的开拓与积累,华中学者迅速跃出早期村民自治研究的偏狭视域,大踏步地推进到乡村社会结构与性质、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等研究领域,并形成了有别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的对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认识。

中国是个巨型国家,内部差异巨大。且不说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历史文化形态也有差异,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①,只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吸纳到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来。“中国”“中国人”“农村”“农民”依然是不假思索内涵一元内在同一的“能指”,这构成了许多具体研究的起点。以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为例,学者们固然自觉地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与西方心理学保持一定距离,试图从本土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中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但却无意中又陷入了将中国人“普适化”“同一化”的窠臼,中国人似乎由同一个理想的文化社会模盘中脱胎而来^②。有趣的是,倒是一些有“异乡”生活经验的文学家敏锐地发现了各地人在性格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别^③,但这些差别似乎无法在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得到恰切的解释。

其他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有关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普遍存在只有时间性而无空间性的问题。这些研究普遍采用

① 这方面研究非常多,可参考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于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缘起、发展历程及主要学术观点可参考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博雅华人本土心理学丛书”,该丛书精选了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代表作品,其中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三人合编的《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下)》更是一本集大成的作品集。

③ 鲁迅等:《北人与南人(上下)》,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

“传统—现代”这个二元框架及其衍生品(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农民—市民”)。我们且不去争论这种线性历史观恰当与否,即使在接受了这个框架之后,我们仍然要追问:是否中国农村都在经历同等意义上的变迁,并遭遇相同的转型问题?各地农民是否也要在这相同的变迁中面临相同的观念、心理和行为转型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似乎不宜在理论或方法层面陷入争论,而应该到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中去观察研究。

华中学者在经验调查和研究中发现了农村社会变迁的“空间性”问题,也就是“区域差异”,并在乡村治理、农民人情交往、农民面子观念、农民自杀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乡村社会性质,特别是社会结构差异,与社会运行机制、农民行为逻辑乃至农民的价值意义世界高度紧密相关,由此形成了乡村治理和政策实践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反映到农村社会变迁中各地农村在涉入广度、深度、表现形态和遭遇问题等方面的不同。

在近年来的农村调查中,笔者逐渐对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有了初步的认识。在严格遵循村治模式的调查要求、对农村社会进行整体性理解的同时,笔者一直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变迁怀有极大的兴趣,尤其关注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洪流中农民个人命运沉浮和人生焦虑。这些年来,一些农村在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伦理性危机,农民在追寻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时遭遇到的困惑、失落、彷徨乃至“异化”都让笔者难以释怀,而作为一个农村人,这些问题又常引起切肤之痛;作为一个研究者,笔者清醒于这些情感不可带入研究之中,始终保持在观察和思考时的冷静与理性。笔者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非只是我们这些书斋中的研究者不自觉地以医生的眼光误诊而来,而是确确实实地在各地农村差异化地上

演着。究其根源,我以为是农民对如何“成为人”和如何“做人”方面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农民一如既往地感叹“做人难”,但不要以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之感叹的自然延伸,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做人”之难是空前的。

因此,本书的旨趣首先在于建构一套理解中国农民做人的理论框架——正如本土心理学想做并正在做的那样。其次,在时空情境中,充分展示和详细分析农民“做人”的不同遭遇与因应逻辑。具体地说,所谓时空情境便是社会变迁与熟人社会的结构差异,“做人”便是在这种时空情境中展开的,作为“人”的意义也是在这种时空情境中实现的。

二、研究回顾

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self-actualizing)的概念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提出并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它在马斯洛早期需求层次理论中属于最高层次的需求,是一个“成为你所能成为的那个人”^①的内在追求。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思想,比如“仁”“践形”“尽己之性”等^②;梁漱溟先生也指出,儒家就是指导“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③。因此,在中国语境中,自我实现其实就是做人,它不仅是身体意义上的“个体”自我的事情,还牵涉到自我与他

① 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许金声:《张岱年先生谈中国传统哲学与自我实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2期。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可大致分为自我实现、自我、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熟人社会的结构四个研究领域。

(一)自我实现研究

马斯洛最为人熟知的贡献便是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并将各种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区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就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①。后来他又提出了自我超越的概念,将自我实现区分为健康型的自我实现和超越型的自我实现两种,前者仍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动机,后者则受高级需求——即超人类的价值、存在性价值或宇宙价值——的激励。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主导了心理学领域数十年的相关研究,从他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即“自我实现”是个体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过程,潜能深藏于每个人身体之内,人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积极进取,勇敢地克服外部世界设置的重重壁垒,实现真实圆满的人生。其逻辑起点是以身体为边界的“个人”,实践过程是征服与自我对立的外部环境,最终目的依然落回“个人”的高峰体验。社会在这种“自我实现”中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自我实现完全成为“个人”的事情,与他人、与社会无关。马斯洛晚年提出了“超越性”问题,强调一种与世界宇宙一体的“无我”体验,突破身体“自我”的狭隘边界,但这种超越反而将“个人”与抽象价值

^① 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7页。

和超验世界关联起来,更加与现实社会脱离关系。

中国古典哲学以人的问题为研究的中心,孕育了深厚的关于“自我实现”的思想,其中又以儒学相关论述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①。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自由和个体价值,中国文化更强调人在人伦关系中实现自我。梁漱溟认为儒家并不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偏执一端,而在伦偶相对关系中对人以具体要求,“一个完满的人格,自然就是孝子、慈父……一类之综合”并使人敦厚其情感,以礼俗之所尚向内用力而自勉成人^②。杜维明认为西方自我实现文化中“人际关系必须被整个儿地抛掉,因为它引起了关于自我的虚假的观念”,“真实的自我实现要求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沉浸于绝对孤立之中的勇气”,而儒学却有本质不同,人际关系恰恰是认识真实自我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性不仅是人们向往的品质,而且是最高的人生境界的显著特点”^③。不过,杜维明似乎认为这种不同仅仅是在自我实现的路径上,也就是他人与社会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与自我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学所讲的自我实现“最终基础存在于自身性质之中”,“人具有实现自身存在所有的极大潜力的内在力量,而且他的创造的力量是自身的‘性’所固有的”,从这段表述我们似乎发现了马斯洛的影子,也就是自我实现对中西方人来说都是要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值得讨论的是,一旦将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基础归结到“性”上面,或许就把“人”本质化和孤立化了。如果人所要实现的“性”是自身固有的,那么在“性”的自我实现中,“社会”的意义就变得有些

① 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107页。

③ 杜维明著,胡军、于民雄译:《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暧昧了。梁漱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中肯的,儒学所讲的自我实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玄乎,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中”,因此,“人”的规定性也并非某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就是这个“伦常日用”,人的自我实现其实就是个孝子、慈父等等。这样,自我实现的动机与途径就是一体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他人与社会都不是外在于自我的。

上述研究的启发是,首先要注意人具有多层次的需求,而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给人带来的生命体验是不同的。其次,对于中国人来说,需求并非仅仅来自个体的内在要求,而是来自伦偶相对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人和社会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笔者在操作“自我实现”的目标时,会将其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而在分析其实践机制时,也会将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最后,自我实现终究是一个在生活中展开的实践性观念,因此必须置于实践逻辑中考察。

(二)自我的边界研究

自我是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在传统心理学研究中,自我一般被视为一个自足的个体属性。陆洛曾对西方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做了系统的总结,“在西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中,自我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是以真我为核心,以追求一致性和统合性为最高原则。西方的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的分离甚至对立,强调个人性的自我内涵,凸显个人的独特及与众不同,也认为公开与私密的自我应保持一致,此即对自己绝对的诚实。对西方人而言,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是相当明确而且固定的,而自我的终极目标是将个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①

^① 杨国枢、陆洛主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